

铭记历史
缅怀先烈

寸性奇：为国战死 无憾此生



这是寸性奇像(资料照片)。
新华社发

在云南腾冲居民、抗战历史研究者寸猛家的老宅里，一封曾祖父寸性奇在烽火中写给曾祖母罗树勋的绝笔书信复印件，被仔细保存在书柜中。每年清明节，寸猛会重新翻开这封信

抄件，把曾祖父的故事一遍遍讲给后人听。

寸性奇，字念洁，1895年生于云南腾冲。他少年立志，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，次年便加入同盟会追随革命洪流。辛亥革命、护国讨袁、东征北伐，血与火的征途锻造了他，1923年后，任孙中山建立的大元帅大本营少将参事、中央直辖宪兵司令等职。1926年，他参加北伐战争，任国民革命军第31军参谋处长，1927年任第34旅副旅长。

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寸性奇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12师34旅旅长，率部参加太原会战。

1938年，因战功显著，他升任第3军12师师长，并奉令调守中条山，担任西面阵地防守任务。此后的四年间，第3军12师如磐石般扼守中条山防线要冲，寸将军“屡战屡胜，威震中条”之名令敌胆寒。

1941年5月7日，日军集结十余万重兵，动用百余架飞机、数百门重炮，发动了对中条山的猛攻。东线、北线、西北线友军相继溃退，唯西线寸性奇部如定海神针，死死顶住日军的狂攻。

战至10日正午，寸性奇右腿被炸

伤，但他看也不看，只管指挥战斗。在率军冲锋中，他胸部与左肩中弹，腰部负伤，已不能行走。营长李振邦见他伤势很重，请求带兵守护。寸性奇挥手要李振邦等迅速突围，说：“毋以我累。”

13日晨，中条山的炮火撕裂了黎明，寸性奇以重伤之躯，指挥余部冲出胡家峪。后至毛家湾阵地上，又遭日军重重拦截，炮火猛烈，夺路不得。寸性奇左腿被炮弹炸断，血染焦土。深知最后的时刻来临，他拒绝拖累部下，从容自戕，壮烈殉国，将四十六载的生命，献给了中条山的抗日烽火。1942年，寸性奇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中将。

早在战云密布的5月初，他已写下给妻子罗树勋的绝笔信：“受命驻防以来，早已将中条山视为殉国之处，自无所惧者。余战死于此，正是军人所应承担职责，一生戎马征战，能为国战死，即为余之幸事，可无憾此生矣。”

信中对年近九旬老父的牵挂、对妻儿清贫度日的愧疚，字字锥心，却更衬托出他为国捐躯的决绝：“身后抚恤金悉数捐献国家……吾家本是家徒四壁，汝等度日之难，余何尝不

知，然而今日国难未止，汝等惟有艰苦以度日。”

1986年5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寸性奇为革命烈士。2014年，寸性奇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1989年，寸性奇将军忠骸荣归故乡腾冲国殇墓园，墓碑由当地特有的火山石镶砌而成，上刻“抗日烈士、陆军中将寸性奇将军之墓”几个大字。

“国殇墓园开馆的每一天，寸将军的纪念碑前都放满了鲜花。”滇西抗战纪念馆的讲解员寸波艳说，寸性奇将军墓是参观国殇墓园的重点讲解点，自2012年入职以来，她已讲解过上万次寸性奇将军的故事。她希望在一次次讲解中，可以让更多市民和游客了解抗日英雄寸性奇，并深切感受腾冲这座浸润着英烈鲜血的土地所承载的厚重历史。

寸性奇将军的一生，是“小我”熔铸于“大国”的壮丽写照，以自己慷慨赴死，换取袍泽一线生机，以戎马燃尽，照亮民族暗夜。绝笔信中那“无憾此生”的平静与殉国时的坦然，共同铸就了一座精神丰碑。寸性奇用生命印证：捍卫家国的血火疆场，是军人的至高荣耀。（据新华社）

压岁钱的来历



如今过年，小朋友最盼的莫过于手机“叮”的一声，红包到账。但你是否想过，古代没有微信也没有纸币，压岁钱又是如何流行开来的？

压岁钱，并非一开始就是红纸包着的钱币，其中的讲究与心意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厚。大年三十，古人阖家围炉守岁，灯火彻夜通明，这一习俗除了寄托团圆之意，还衍生出守护孩童的美好期许。旧时民间有这样的说法：年三十夜里有名为“祟”的小妖，会惊扰熟睡的孩童，人们便希望用特别的方式护佑孩子平安。于是家长们想出办法，用红线串起八枚铜钱放在孩子枕边，借铜钱的吉祥寓意守护孩子，这便是“压祟钱”的由来——其核心是“护佑平安”，最初的压岁钱并非用于流通花费。

最早的压岁钱，更像是承载吉祥寓意的民俗信物。汉代就有一种不能流通的“厌胜钱”，钱面上刻着“天下太平”“去殃除凶”的吉语与祥瑞图案，专门用于佩戴或压箱底，堪称压岁钱的古老雏形。

“压祟钱”从民俗信物转变为承载祝福的压岁礼物，离不开唐朝的奢华风气与宋朝的市井烟火。唐朝国力强盛，宫廷中流行“洗儿钱”习俗：宫中诞下新生儿，会专门铸造钱币，用锦缎串起赏赐给孩子，寓意富贵吉祥。这种风气从宫廷传到贵族阶层，再渐渐影响到民间，“用钱传递祝福”的理念就此埋下种子。

到了商品经济繁荣的宋朝，过年赠钱的习俗才真正在民间普及开来。当时所用的多是流通铜钱。年三十晚上，长辈会用红线将铜钱串成一百枚（寓意“长命百岁”），或是编织成鲤鱼、龙等吉祥造型，放在孩童的床脚或枕头下，延续护佑孩童的美好习俗。等除夕过后，这些铜钱才归孩子自行支配，用来买零食、玩具。北宋《东京梦华录》中，就记载了过年时“小儿争相跪拜，领压岁钱”的热闹场景。自此，“护佑平安”与“新春贺岁”的双重寓意，便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。

明清时期，压岁钱的习俗愈发规范，也更接近现代。用红线串钱太过繁琐，人们开始用红纸包裹铜钱，这便是“红包”最早的雏形。

有趣的是，古代的压岁钱并非单向馈赠。长辈会给小辈发，小辈有时也会给长辈送。送给老人的压岁钱，意在为长辈“压住年岁”，期盼长辈健康长寿。压岁钱的寓意，也从单方面的守护，变成了双向的祝福，其中的温情愈发浓厚。

由此可见，古人流行送压岁钱，流行的从来不止是钱币本身，更是一整套底蕴深厚的年俗与情感寄托。它从承载吉祥寓意的民俗信物，逐步演变为传递美好祝愿的压岁礼物，一枚枚铜钱、一个个红袋里，包裹着最朴素的愿望、最真挚的祝福，以及最紧密的家族纽带，让过年不只是一顿年夜饭，更成为一场充满期待与传承的仪式。

如今孩子接过电子红包，感受到的是一份便捷的欢喜；而古人接过那沉甸甸的铜钱或红纸包时，接住的是一整年的平安期许与家族的深深护佑。这份跨越千年的心意，才是压岁钱能够流传至今，真正被人们喜爱的核心。当下的电子红包固然方便快捷，可相比之下，是不是少了几分亲手传递的郑重，以及指尖触碰时的那份温度？

（据《北方新报》）

高凤英：凝聚蒙汉力量 浴血青山的抗战英烈

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中心小学，教学楼前矗立着一位烈士雕像。他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，目光如炬，风华正茂……这是烈士高凤英（原名德勒登）。他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、屡立战功的抗日队伍指战员、军民口中的“云队长”。

1928年冬，德勒登与赵莲莲成亲。次年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文贵出生。当年春早秋涝，受压迫的穷苦人无以为食，饿殍遍地，也是在这一年，德勒登留学苏联的堂姐夫佛鼎回乡，这名共产党员受命回国发展内蒙古地下党组织。赵莲莲发现，常与佛鼎来往后，眉头紧锁的丈夫变得意气风发，时时不知疲惫地在外奔波。她不知道，丈夫有了新身份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婚后刚两年，一天早上，丈夫如往常出门，又折返回来，抱起儿子不

停亲抚，临别时多看了几眼忙碌的妻子。赵莲莲没想到，这一别就是5年。德勒登与十几名有志青年同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，系统学习了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基础科学等课程。1935年，为组织民众抗日救亡，26岁的德勒登被派回国，从事地下工作。出于工作隐蔽需要，他为自己起了一个与魁梧身材颇具反差的名字——高凤英。

地下党员高凤英四处奔走，为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支持。经过多次做工作，高凤英曾将一个排的蒙古族士兵从伪军阵营拉到游击队伍。此外，他还争取大量物资支持，为游击队伍提供关键情报。

1938年春，为给游击队的机枪购置配件，高凤英乔装打扮进入敌占区绥远城（今呼和浩特市），不料被便衣警察逮捕，送进了日本宪兵队。赵莲

莲心急如焚，四处求助。经过20多天多方斡旋，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高凤英终于得救。

几日后，一次敌军进村，还未痊愈的高凤英翻墙逃离。不承想，赵莲莲被敌军抓走。她忍受折磨，咬紧牙关不肯透露丈夫行踪。高凤英与弟弟卖掉家中骆驼，四处筹款，设法救出了妻子。

随着高凤英在大青山与敌斗争日趋激烈，敌人屡次受挫，加强对其家眷搜捕力度。赵莲莲在熟人帮助下，带着孩子进山与高凤英团聚，和游击队一同行军转移。据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高铁军采访记录，当年尚年幼的次子文精有些印象，常在黑夜随部队转移，父母制止他哭闹以防暴露行踪。此后母子三人经常寄居在游击队驻地旁的不同山村，被当地军民称作“游击家庭”。

1940年秋，高凤英受任蒙古抗日游击队队长，更名为“云吉祥”，被当地军民称作“云队长”。他带领一支由蒙古族群众组成的武装力量转战绥西地区。临行时，赵莲莲告别丈夫，多年后她仍记得当时依依惜别对丈夫说的话：“你放心，我再苦再累也能顶得住，一定要把孩子带好。”那是她和丈夫的最后一面。

1941年秋，高凤英等12名烈士在与敌军战斗中牺牲，长眠于大青山。如今，这里的槭树叶于每至秋日殷红如鲜血，如诉当年烈士的满腔热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高凤英等烈士举办的追悼会上，已读小学的文精代表烈士子女发言。他铿锵有力地讲：“一定会继承父辈遗志。”赵莲莲扶着灵柩，她多么想丈夫也能看到这梦寐以求、为之牺牲的新社会。（据新华社）

马字溯源

“马”，这个看似简单的汉字，并非凭空而生，它的每一个笔画都藏着岁月的痕迹，每一种形态都承载着古人的智慧。从远古先民的刻画到如今的日常书写，马字的源流串联起汉字演变的脉络，映照出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。

“马”字最本真的模样，藏在古老的甲骨文中。古人以象形之法造字，将骏马的身形凝练于刀笔之间：头朝上，背向右，尾朝下舒展；颈背的鬃毛以三两笔简括勾勒，四足劲健分明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腾跃而出。这种对形态的精准捕捉，足见马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——那时的马，是出行的伙伴、劳作的帮手，更是征战的良驹。正因为人们日日与马相伴，方能将其神韵深深刻入文字。

金文里的“马”字更显灵动，特意突出了炯炯有神的双目，仿佛能透过字形，感受到骏马喷薄欲出的力量与锐不可当的英气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字的演进，“马”字逐渐褪去具象的形态，走向线条化与规整化。小篆中的“马”字，已难觅完整的马形，却在笔画间依旧保留着骏马的神韵；转折处的刚劲利落，恰似骏马遒劲的筋骨。

到了楷书阶段，繁体的“馬”字笔画繁复却结构严谨，下部的四点底如同骏马的四蹄，稳稳承载起整个字形的重心；而简化后的“马”字，仅用三画便囊括其意，笔画简练却骨力洞达，既方便书写，又暗合骏马的矫健姿态。这种演变绝非简单的笔画删减，而是古人在实用需求与审美追求之间的精妙平衡。每一次字形的调整，都映照着时代的变迁，也延续着文化的传承。

“马”字的源流，从来不止于字形的递变，更在于其含义的丰富与延伸。许慎

《说文解字》释“马”为“怒也，武也”，这恰是古人对马之性情的精准概括——马既有昂首怒目的刚劲，亦有驰骋疆场的勇武。正因这份独特的精神特质，“马”字衍生出诸多关联义项：古人称同类中的形体较大者为“马”，如马蜂、马蓼，皆因其体型出众；“马”还曾借指计算用的筹码，《礼记》中“请为胜者立马”的记载，便印证了这一用法。

而随着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关键，“马”字更被纳入部首，衍生出众多相关汉字——或记马的种类，或载驭马的动作，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“马字家族”。

“马”字的源流里，更蕴藏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。古人爱马、赞马，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寄托于与“马”相关的文字与意象之中。“千里马”象征济世贤才，“龙马精神”传递昂扬向上的斗志，“马首是瞻”代表坚定的追随与信赖。从《诗经》中的“陟彼高冈，我马玄黄”，到韩愈笔下的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”，再到杜甫“射人先射马”的写实描绘……“马”的意象始终与家国情怀、人理想紧密相连。这些与马相关的诗句与典故，让“马”字超越了单纯的文字符号，升华为深植于民族文化的精神象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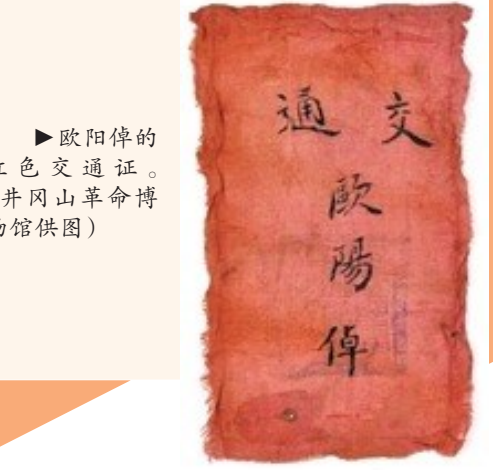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我们书写着简洁的“马”字，使用着由“马”字衍生的词语，更不应忘记其背后的源流与深意。“马”字的每一笔画，都承载着古人的生活智慧；每一种含义，都凝聚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马年话“马”字，追溯其演变源流，既是对汉字文化的致敬，亦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。

愿承载着千年印记的“马”字，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传递力量与希望；愿我们皆能带着这份昂扬向上的精气神，笃定前行，不负岁月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尘封墙洞里的红色交通证



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店上村的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旧址。（资料照片）



► 欧阳焯的红色交通证。（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供图）

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柜中，静静陈列着一张巴掌大小的红绸布证件。这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，红色情报交通员欧阳焯的通行证。如今，这张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通行证，不仅为研究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色交通提供了重要历史见证，也生动展现了无数像欧阳焯这样的革命先辈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。
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毛泽东同志率部抵达井冈山地区，着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。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中段，地势险峻、交通不便，加之国民党反动派频繁发动军事进攻和实施严密经济封锁，根据地面临信息不畅、指挥失联的严峻局面。

为冲破敌人封锁、解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外联络特别是情报传递难题，我党在湘赣边界成立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，专门负责通信联络工作。随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红军依托地方武装配合，在各级县、区、乡政府内普遍建立秘密联络点作为递步哨，每个递步哨由5名至7名交通员组成，受各级政府直接领导。交通员主要承担传达文件任务，同时负责转运药品、物资及护送相关人员。选拔交通员同样至关重要，既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，又要机智勇敢、熟悉井冈山地形。

经过精心考察和严格审查，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欧阳焯因忠实可靠、纪律性强且政治觉悟较高，被选为红色情报交通员，负责往返于茶陵至永新一线侦察敌情、传递情报。无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，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都留下他坚毅的足迹。而这张交通证正是他执行任务的重要凭证，凭借此证，他才能取得收信方收据并顺利返回复命。（据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（据《中国国防报》）